

高教研究丛刊(五)

德国的大学

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PDG

编 者 的 话

本期丛刊登载了有关德国大学的二篇译文。

柏林大学教授鲍尔生 (Friedrich Paulsen) 所著《德国大学和大学学习》一书是研究德国大学教育史的巨著, 初版于1906年。此书详尽地叙述了自十四世纪到本世纪初德国大学的发展、结构、作用以及与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 (Michael E. Sadler) 曾为该书英译本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我们从该书的第一、三、四卷中选译了五章。

《德国的大学》选自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所著《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1930年)。作者针对二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对美、英、德三国的大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和精辟的阐述。

我们希望本书能有助于读者对德国大学历史发展的了解。

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1984年5月

目 录

《德国大学和大学学习》选译……………（ 1 ）

德国的大学……………（ 127 ）

《德国大学和大学学习》选译

第一卷第一章 中世纪的德国大学

1.起源 在中世纪后半期的早年，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大学。这段时间的前半期，人们只往后着眼于基督教和古代世界，但在十一世纪之末，他们开始向前看了。那时候发生了浩大的理智革命。十字军的东侵不仅使东方各民族相互接触更加密切，也加强他们和西方世界的联系，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从此出现在欧洲人的理智视野中。骑士精神表明是世俗文学和文化的新的保护者，这种基督教会的理智的骑士精神建立在新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多明我会（Dominican）里，在新神学和哲学的迅速发展中有盛名的人士都属于这里面。到处开始感到要求知识，首先是想把那些人们过去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的信念，予以彻底理解，并把它合理化，以便能更充分和更有意识地吸收和消化。同时，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主要著作，受到大家的重视。这样，就发生了如何协调信仰和知识教义和哲学的问题融为一体。在十三世纪的哲学体系中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这个新的理智世界诞生了大学，作为它的器官或支柱。巴黎大学是西方世界第一所伟大的大学，成为当时新神学的哲学思维的活动中心。德国大学特别继承了巴黎的传统。但是意大利独立地建立起来的大学，特别是波伦亚大学，原始是一所法律学校，对它们也不无影响。

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还有西班牙的和英国的大学，最老的可溯源于十三世纪，甚至早在十二世纪，然而德国的大学则

到十四世纪的后半叶才出现，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前者于1348年由卢森堡王朝创建，后者于1365年由哈勃斯堡王朝创立。两者都位于德国文化范围的东方边缘，显然因为在那个区域里已建立起广泛的自主的地方权限，又大概因为沿着莱因河的老基督教学校，值得注意的是科隆的学校，早已和巴黎大学维持着密切关系，使巴黎大学易为西部接近。在这世纪末期相继成立的，西部有海德堡大学（1385）和科隆大学（1388），中德有埃尔富特大学（1392）。后两所是市立的。这三所大学的建立，一部分是由于巴黎大学因教会产生宗派而瓦解所致。科隆早已是教会学习活动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在这里，阿尔倍土·马格奴斯（Albes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执教于多明我会的学校，而敦斯·斯可斯（Duns Scotus）则执教于方济各教会（Minourites）的学校。据Denifle说，早在1392年以前，埃尔富特已有一所有组织的学校，它不久要求称为大学。为了补偿布拉格大学的损失——由于胡斯（十五世纪捷克的爱国者与宗教改革者）的追随者的骚乱所造成的德国文化损失——萨克森公爵为移居来比锡的教师和学者创建了来比锡大学（1409）。1419年，罗斯托克市在和统治者的合作之下，创立了这时期的最后一所大学。

第一期的七所大学，除了两所，现在都还存在。科隆大学和埃尔富特大学，在十五和十六世纪之交，是第一流的大学，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却跟它们所从属的基督教会的州一起消失。科隆大学于1794年取消，埃尔富特于1816年取消。这风暴对于许多古老大学同样发生破坏作用。

从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出现第二批大学。新建的德国大学不下于九所：格赖夫斯瓦尔德（1456），弗赖堡（1460），

巴塞尔(1460), 英果尔施塔特(1472), 特里夫斯(1472), 美因兹(1477); 杜平根(1477), 维滕堡(1502), 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1506)。除了格赖夫斯瓦尔德和巴塞尔, 都由政府创立。开头三所和杜平根, 如今仍存在于它们的原址。特里夫斯和美因兹, 原是两所主教派教会大学, 从未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十八世纪末, 跟它们所从属的基督教会的州同道停办了。其他三所, 在十九世纪之初, 或则迁移他处, 或则与其他学校合并。英果尔施塔特初迁至兰次胡特(Landshut)(1800), 再迁至慕尼黑(1826); 维滕堡合并于哈雷(Halle)(1817)。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则和布雷斯劳合并(1811)。

2. 组织和规程 首先, 关于名称需要说几句话。大学的原来名称是Studium generale, 即各地学者来学习的学校。所以这样称呼, 原因是要有别于Studium particulare即城镇或省里的学校, 而大学则是面对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学校, 不受国家或地理界线的限制。事实上, 大学所授与的学位, 是到处被承认和接受的。在另一方面, 大学这名称所内涵的意义, 不同于一般的学校, 宁可说它是由讲师和学生组成的公民社团, 这种社团, 依靠种种豁免手段, 为自己取得一种合法的公共社团地位。因此, 它往往被说成是巴黎生活方式型的老师和学生的大学, 或者是布拉格型或维也纳型学习的大学。这种称呼逐渐取代原来的名称, 并变成这类学习机构的名称, 具有现代意义的为人文学科大学。

建立的步骤 德国的大学, 不像法国和意大利的最早学校, 并非自发地产生, 而是一定计划的结果, 通常公民和基督教会当局对此是共同关心的, 实际创办者是地方政府或自治机构。统治者制定计划, 供应建筑和基金, 同时, 授与大学一定

的社团权利，例如自治权，对于内部成员的裁判权，并豁免义务和捐税。第二步是呈请上级承认，特别是罗马教皇，取得一种“教皇训令”，大学才赋有它的价值，它的建立与基金才算最后批准，此后才有权进行教学，主持考试，和授与学位。由此可知中世纪的教育概念是基督教作用的。稍后，同样须取得帝国的批准，渐成习惯，因为帝国的权力对于大学也有某种魔力，此外“罗马法”也是“帝国”法，已成为流行的观点。弗赖堡大学开始这种实践。这样，新大学成为特权的学习机构，或“特权学校”。

组织方式 最早的德国大学（布拉格和维也纳，来比锡是模仿它们的，法兰克福又是模仿来比锡的）采取双重组织：“学院”和“同乡”，这是源于更老的范例的。为了便于教育，教学力量分为四个学院，又为了行政的目的，整个“社团”安排成四个“同乡”（如在巴黎一样），每个成员依照他的籍贯分派在一个“同乡”里。学院的分类作用，是根据教育性质来进行教学，主持考试，和授与学位。每一学院选出院长一人为主管官员。“同乡”的分类，是为了行政和管辖的目的。每一“同乡”选出检察员一人作为主席。大学的最高主管是校长，从四个“同乡”里选出，包括教师和学者。但是这种组织不久就废除了，行政功能也逐渐由学院取代。后来创办的大学，甚至如海德堡和埃尔富特，都只有学院的分类。在波伦亚或巴黎大学里，常常有许多年龄稍大的外国学生，所以学生团体特别多，德国大学里则不然，也没有那种共同兴趣的强烈感觉。然而，古老的教师和学者的社团统一体尚残留着一种习惯，就是容许校长从学生团体中选择，甚至实行于学生没有投票权的大学里。这种实践继续流行得很长久，为的是把校长这种荣誉授与王子和贵族，他们为了这种目的被录取进大学。大

人物的名望的光泽也用这种手段反映在大学里。通常设有一个副校长处理实际行政事务。

起初，每个人属于他从那里接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院。事实上，学位的授与意味着接受者由此成为学院的一员。但是自卫本能不久逼出某种差异，先是实际授课者和非授课者间的差异；后来是老练久任的教师和新手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人文学院尤为显著，由于它的成员众多，和资格时常变化。于是从这种赋有完全特权的成员的狭小圈子里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即理事会，初意是为了全学院会议准备工作预算，但后来完全取代了整个团体。这是后来的社团学院的预兆。

上学人数 这里，传统上照例在数字上是很慷慨的。据说，在布拉格或维也纳，同样是在巴黎或牛津，各有几千几万的学生。保存下来和近来公布的许多大学的录取名单也不否定这种报导。当我们发觉任何地方特定年的录取人数有五百到一千时，加上推想每个学生住校四年到六年，无疑地就和这种大数字接近了。但是更慎重地考虑当时环境的可能性，和原始来源的情报的临界应用，导致我们采取较保守的数字。这里不需要深究细微，但如推断德国最大的大学（或者维也纳除外）的录取生不会多于一千人，那是离事实不远的。较小的大学只录取几百人，甚至更少。数字大的属于较低级的人文学院（或哲学院，是十六世纪以后的称呼），三个较高级的相信仅有小数字，而其中法学院似乎享有最大的入学人数，其次是神学院，至于医学院，平常是很不重视的。

惯例 中世纪的德国大学生活，和现在很少共同之处。那时的大学，可说是一所大寄宿学校。教师和学生，不论怎样，在人文学院里是共同聚住在学校建筑里的。每所大学里有一个以上的建筑物，对于初级拉丁语学生也常常设有一教育班。如果

上学人数增加，建筑物不够分配，有些教师建筑私人寄宿处以供需要。在这些学校里，生活管理是修道院方式的，现在遗存的许多规则可以使我们追迹出各方面的细节。这类寄宿处寻常包括许多公共用的房间——例如，集体寝室、食堂、学生自修室、课堂，及一间教师举行会议的房间——也有私人用的部分，教师住的房间和学生住的密室或寝室（不能加热的房间），这种安排，一方面是基于教师的独身生活，另一方面是基于学生的青年年龄，平均在15岁到20岁之间。整个生活方式，下至微行细节，都受大学所制定并受其支配的规章的节制。起息时间，每日两餐的钟点（正餐上午10点，晚餐下午5点），服装的式样（当然是牧师所穿的类型），授课复习的时间，总之，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则。对于喧闹、游荡、携带武器、引进妇女等，当然也有禁律。可以有把握地设想，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有许多文件可以证明，那时和现在一样，有各种方法想出来规避这些戒律和清规。

执教人员 在较高级的学院里，讲课先生并不多，常常是2—4个神学家，3—6个法理学家，和1—3个医学人员、神学家和法理学家普通支领基督教会的牧师薪俸，这是已经结合在大学里的。医学院的成员也是开业的医生，就这范围说，大学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支薪教授的教学力量有时由讲课学士来补充。在人文科学学院里，讲师和学生的人数往往都要大得多，在比较重要的大学里，这种讲师可能多至二三十人。老讲师在学院建筑物里有位置，或者有一固定的小工资，或者享受一种牧师薪俸。但是大多数是没有工资的，只是依靠学费和由学者所付出的考试费。然而，这种学院里的成员身份，一般不被看作永久性的职业，只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进身之阶。在人文学院里的讲课教师，常常也是较高级学院里的学生，是

学位的候补者。一旦目的达到，他们或则继续坚守已赋予的讲课职位，但多愿另谋教士的生活。

3.学习过程 青年们到了十五六岁时，已在地方学校里学得拉丁文，一种文学上的语言，然后来进大学。他的第一件关心事是想校长录取他，这须一笔费用，然而，常因有名的学者的缘故，或者很少数为了被他们推荐的学生的利益而得到豁免，第二步是到人文科授课教师处请他收入他的班级。最后，他在老学生和教师或院长面前，去掉他的青年身份，才被承认作为一个大学生（平常称为录取生，是指开始的行动。它包含着意在说明一个初学者进入学术文化世界的全部意义的种种象征性的表现）。这之后，他开始参加人文学院里规定的讲课和练习。如果他太年轻，对拉丁文没有足够准备，就叫他到教育班去学习，或把他安置在一个指导员之下，直至他掌握这语言为止。

人文学科的学程大约长至四年，分为前后两期，以第一次考试为分界线。学生学习了一年半或两年，特别致力于逻辑学和物理学，可以宣布自己已准备好可应第一次考试。如果他能显示已经听足规定的讲课，参加过必需的辩论次数，并已获得足够的知识总数，他当众接受第一个学术学位，即学士的荣誉。考试和学位的授与（提升），仅在固定的时候举行。提升是通过团体的，在团体中个体学生以其考试的成功接受一种位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哲学的其他分支，结合天文学的物理学和数学，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结合政治学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就参加第二次考试，跟随着的提升是文科硕士学位。较高级学院的学习过程是相同的，仅在入门时要求较高的知识成就；并在授予学位时需要较大的年龄。例如，惯例是在接受神学博士之前，必须年已三十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文科硕士必须保证自己在人文学科课程上义务讲课几年。这目的是双重的：第一，可保持学校于不替，因为这种学校没有工资付出，不这样就要常常感到教师不足。第二，这种实践认为可给学生的自己教育一种最后的修饰作用。

中世纪赞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教学能力是学者的特殊标志，因为这种理由，即使学士，不仅容许在辩论上锻炼其才智，且也作为一个讲师。其实，大学里分成学生、学士、硕士诸等级，显然是等同于工艺上分成学徒、工匠和师傅诸等级的。在中世纪手工业工人中普遍存在这现象：学徒只是学习，工匠既学习，又生产，机会来时也要教学；师傅是生产和教学。在地方学校里也找到同样的分类：教师、教伴、和学生。

然而，绝不能设想在这时期这种完成人文学科的过程是对学生的一种规定的准则。较高级的学院所提供的过程并不完全如此。大部分学生没有取得最低级的学士学位就离开大学。在现代，规则适相反，理由是现在任命任何职务，都以申请者对于履行该职务的特定准备为条件，而在中世纪则不然。任何职务的任命，申请者似乎并不需要在大学里居留甚至很短的时间。唯一的情况是在任命基督教会的职务之前——是唯一的，因为世俗职位中没有这一回事——即在授与牧师职位这圣职之前，候补者须得在主教之前通过一种考试。但是这种考试只是间接地对于他的科学造诣作出一些要求，除了对于拉丁文须有一及格的知识之外。甚至迟到15世纪结束时，许许多多的牧师都没有进过大学。然而，可靠的假定是，高级牧师至少需要受过大学教育已逐渐地成为正常的事；而且在牧师会里，常常把一定数目的位置留给神学毕业生。法律知识对于高级牧师也变成越来越重要，而对于教会里较低级的牧师职位，学士或文科硕士学

位常常算是一种重要的推荐。是的，甚至一张注册入学卡可以使他优先于其他竞争者。对于这点，我们有文献目录可证，那是古老大学不时送往罗马教廷的，其中包括所有大学的成员名单，按照学术地位排列，下至单纯的大学生，他们都是牧师薪俸的申请者。

4. 教育材料和教育方法 中世纪大学的教育题材是明确地固定的，教师的任务不过是把这固定的知识总数传授给后继者而已。神学归根到底通过启示得到它的事实；基督教《圣经》不仅是知识的原始来源，也是最后权威。然而，那种有权威的来源，只能依照教堂里所解释的去理解它。这样，把这种既定的教义本体，用自然的理性，通过精心制作和系统化，建立了中世纪伟大的神学体制，最后成为神学教育的实际内容。在法学院里，罗马法和基督教会法律的大汇集是教育的来源和实体，加上注解和术语汇编等补充。医学院也依靠少数典范性质的著作，特别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及一些后来的注释，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其中Avicenna是最闻名的。最后，人文学院所供给的是哲学教育，就是说，纯理论上的各种分枝，是用自然的理性可能引伸出来的。这里，教育的实体也从典范的课本中汲取，首先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其次，在数学方面是欧几里德的著作，在天文学方面是托勒密的著作。再加上有限的几种新课本。

在较高级的学院里，通例是每个教师在被指定的课本上讲课。如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有薪给的、神学、法律、或医学专家。然而，在人文学院里，普遍性的原则在流行，每个教师可以随意讲授任何哲学课本。因此，在每个学期的开端，要把课本分配给那些已宣布要参加讲课的讲师。这种分配，有时凭投票，按年资，有时凭抽签，有时互相轮流，以便大家可以得到

更普及和有报酬的讲师身份的利益。可以假定的是，任何人如已修完整个哲学课程，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而且已取得硕士学位的，事实上就是他所修习的各种科目的教师，并且是知道如何教学的，不期望任何人以自己的智慧成就去补充课程。如果用抽签办法导致课程分配得不理想时，则以交换或放弃办法来取得更妥当的安排，上课时间，收费数量，都预先由法令规定。

教育方法到处都包括互相补充的两部分，即讲课和辩论。

讲课的目的是传授知识。一些典范课本必须阅读和解释，例如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当然是拉丁译文的，这不是说由教师读给学生听，因为设想每个听者面前都有一课文抄本的。有时教师朗诵给班里听，目的是要改进或校正抄本上的句读和标点。为了更容易取得更多的抄本，有时另拨出时间从事听写。但是讲课的基本目的是解释课文意义。比较的记忆法在应用，以图解式的表现法来解释经过慎重决定的课文。

辩论的目的是把知识付之于解决争论问题的实践。这种练习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讲课。在每周大辩论中，教师和学生齐集于礼堂，戴着礼帽，穿着长袍。由教师一人主持其事，先提出论题，请其他教师以三段论法的方式安排论据进行攻击；同时学士们则以回击这些论据来为他们的教师的论题辩护，这种任务，如果机会需要，由主席领导他们。在这些名符其实的辩论之中，学者只以听者的身份出现，此外的辩论，则在教师们或学士们领导之下由学生参加，有些和讲课相结合的练习与再演，很接近于辩论。

中世纪非常重视这种辩论，学生需要参加的次数有明确的规定。教师在这方面如有疏忽，要受到惩处。当时的概念，似乎认为最好的教育过程，乃存在于这类争论中。这种概念不会

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既是获得知识的一种巧妙手段，也是对于已得知识的实践应用。无疑，这种方法适合于增加学生的警觉性，促进理解新概念的才智，和迅速而确实地把新概念消化的能力。我们可以肯定，当时的学生，在这方面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是今天难于比拟的。今天的学者许多事情依靠参考书，中世纪的前辈却是具备在自己的记忆里的。那种和敌手面对面地、迅速而合乎逻辑的明确表示个人思想的艺术，在今天很难遇到，因为社会上不再有这种实践了，或者除非在审判室里。我不怀疑，用这样的理智比赛教导学生掌握一种科目，比起现在叫学生默默地单独复习课文，以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其收获必然要多一些。那种方法，使学生发挥竞赛的激动，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耻辱，从而达到突出所学得的价值，加上重视灵活机智、行动敏捷的目的。

当然，这里并不是推荐今天应该恢复这种辩论制度，而只是说明那时这种实践的合情合理。对我们说，这已成为不可能的了，一部分是外在的理由，我们已不再有古代学院的公社性生活，一部分是因为现在的文化缺少那种一致性，但更特别的是因为知识不再是可争辩的，中世纪的知识体系，是从一定的原则演绎出来的，也可说就是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体系。这种体系，那时不但为一般人所知道，而且普遍地认为是所有科学的坚固和权威的基础。辩论时对谁对谁错，可用三段论法方式把“导师”的原则推理来决定。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公认的普遍原则，至少没有具体的原则，没有这种原则，辩论是不可能得到结论的。这在中世纪时是明显地认识到的：反对原则就是否定辩论。现代科学上的努力指向事实的建立，事实是需要去发现的事情，而不是靠争辩能解决的事情，辩论方法的消逝是直接由于这种科学方法的变化，这变化开始于十六世纪，到了十八

世纪就成为决定性的，现在我们有种补偿的办法，就是在研究班里和实验室里的各种练习。

最后，说说中世纪德国的大学——是德国的大学，须特别注意这点，因为其他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是否为基督教会的学校，可能是适当的。一般的倾向，对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也必须对此服罪，而G·考夫·曼则反对这种倾向，把重点放在世俗性质上。必须承认，他的见解，在形式上和法理上都是正确的。从法律上来考虑，大学不是基督教会的学校。它们的建立、维持，和关于没有授与自治权可以自我管理的学校的管理，都是属于世俗权力的。但在另一方面，从它们的一般性质判断，有很好的理由说大学属于基督教会身分，而不是属于后来称为公国君主权力，下面几点值得考虑：1.在中世纪，知识和教育无可争辩地是教会的事务，这说明大学的建立为什么必需罗马教皇的训令批准，教育也受教会的法令控制。2.大多数中世纪大学里的成员，不因为上述成员资格，或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不是实在的牧师，就是潜在的牧师；送到罗马去的文献目录，说明他们都是牧师薪俸的申请者。的确，那时代除了基督教会里的职位，就只有少数政府职位了。3.支薪的大学教授的工资来源，大部份是基督教会的牧师俸禄，特别是在较高级的学院里，因此，他们也受基督教会的约束，须尽一定的教会义务。4.整个大学生活方式，仿效牧师的模型，大学专科和青年们的管理，显然是修道院式的，无疑的，实际上有些世俗的风习已渗入这种生活，但它们也渗入修道院，和主教住宅，并也渗入罗马教廷本身。

然而，意见所以有差异，完全在于观点立场的不同。如果是从现在的观点看，或者是对现代人说明中世纪大学的性质，那么，基督教会的特性将得到重视。但如从古代教育体制的观

点看，则中世纪大学是抑制并取代当时的修道院并大教堂学校的，可说是把教育导向完全世俗化这过程里的一个阶段。这一点古代意大利大学特别明显，阿尔卑斯山脉南北侧的大学也是如此。由公国创立的德国大学，以及当时由市政当局创立的地方学校，实在是形成教育世俗化的开端。但当时教会并不反对，因为她深信自己的高超地位，以为这种新学校不过是对精神目的的世俗捐赠，和其他领域里的机构是相同的，所以授与管理的地位作为对公民当局的报答，但是那种可称为知识的主观世俗化也因此引进了，因为是在大学里，文学工作和科学教育首先达到一种作为独立职业的地位，独立于基督教会的职业和心灵的教化（牧师的职责）之外；并且现在是和希腊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罗马法、及希腊、阿拉伯的原始医药学问，都在经常接触之中，人类的思维逐渐从狭窄的神学—基督教教义的限制中挣扎出来，开始形成追求自己的准则的习惯。那是无疑的，中世纪的大学，替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主观理性的大解放开辟道路，即使它们的态度在许多方面是敌视这两个运动的。

第一卷第二章 近代德国大学的发展

I、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

中世纪通过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进入现代。这些强大的运动，对于大学也有引起转变的影响。

1.文艺复兴 德国大学为新文化所征服，是在十六世纪的开头二十年内，将要来临的浪潮，甚至是自十五世纪中叶起，在出现一些预兆风暴的海燕之后，即已预感到的。在这全部时间里，新旧之间发生艰苦的搏斗。整个大学的传统教育，特别是流行在人文学院、哲学院和神学院里的，受到代表新诗和新文学

这文化的人们的极端猛烈的攻击，他们自己标榜为雄辩家和诗人，而与哲学家相对抗。当时流行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同样受到极端轻蔑的谴责，目为愚蠢的原始风尚。聚集在埃尔富特的Mutian附近的青年诗人集团，于1516年左右创作了《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其中青年一代对于老一代的仇恨和轻蔑，新文化对于老的大学概念的仇恨和轻蔑，作出不朽的表现。

体现人文主义活力的最重要人物是伊拉斯莫斯(Erasmus)和罗希林(Reuchlin)。后者对于希伯来语的研究在德国开辟道路，又给希腊语的研究一种富有成果的动力，伊拉斯莫斯是一个能力强而心灵活动的人，他教德国人一种单纯、自然、和优美的拉丁语，到处唤醒人们对于更美好的文化的爱好，为历史语言学的调查研究铺平道路，并通过他的《新约圣经》研究，使人文主义和神学发生更密切的关系。然而，他的特殊工作却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神学的烦琐体系转移到对于原始来源和古代教会文献的研究上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曾再三地和强求地逼迫他接受大学里的席位，却常常被他拒绝，无疑，因为他认为这种职位并不和他的重要相称；他的自己安排的任务是发扬和散布新的和独立的文化于人世间的文化大社会里。

新文化在全线上获得胜利，到了1520年，已在所有较大的大学里生了根。在新的课程表里，教学和考试到处有新的分科，最初是和老课程并列。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古典拉丁语取代了基督教会使用的经院拉丁语，亚里斯多得德哲学的拉丁译本为新的人文主义译本所代替。2.希腊语在大学里占据了一席位。到处建立了希腊语言和文学的讲师职位。3.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作家，特别是诗人和雄辩家，都包括在课程里，作为诱导学生从事文学上的模仿之用。在德国大学里最早的希腊语